

纽马克翻译理论视角下《红楼梦》“好了歌” 维吾尔语翻译研究

阿依铁肯·乌买尔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3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3日

摘要

本研究以《红楼梦》开篇核心诗词《好了歌》的维吾尔语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关于文化建设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以及纽马克翻译理论，探讨中华经典文学作品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传递问题。在理论应用方面，研究验证了纽马克“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策略在民族语言翻译实践中的适用性。针对文化负载词，本文着重分析诗歌维译过程中是否实现了“语言准确性”与“文化适应性”之间的平衡。在句法与韵律转换层面，译文一方面通过语义翻译保留原诗的排比结构、反问语气等形式特征；另一方面，采取交际翻译策略，适应维吾尔语作为黏着语的语法特性及其诗歌韵律习惯，使译文在传达原作哲理深度的同时，兼具目标语文化语境下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在文化传递层面，本研究进一步凸显了中华经典翻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好了歌》，汉维翻译，翻译策略

Translation of *Haoliao Ge* from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ased on Newmark's Translation Theory in Uygur

Ayitiiken Wumaier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Received: June 1, 2026; accepted: July 13, 2026; published: July 23, 2026

Abstract

Taking the Uygur translated version of *Haoliao Ge*, the core introductory poem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principle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Newmark's translation theory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works into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this study verifies the applicability of Newmark's semantic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the practice of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culture-loaded words, the paper analyzes whether a balance between linguistic accuracy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is achieved in the Uyghur translation of the poem. At the syntactic and prosodic level, the target text retains formal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such as parallel structures and rhetorical questions via semantic translation; meanwhile,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is adopted to accommodate the agglutinativ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Uyghur and its poetic norms. As a result, the translated poem conveys the philosophical profundity of the original while guaranteeing readability and appeal within the target cultural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research further highlights the vital role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Haoliao Ge, Han-Uyghur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好了歌》作为《红楼梦》开篇的经典诗词，言简意赅，实则为整个故事的走向与结局埋下了重要伏笔。以其深刻的哲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熠熠生辉。对其进行汉维翻译，具有多方面不可忽视的价值，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实践。

要做好文化传播，首先必须深刻理解文艺作品的创作根源与时代价值。在《好了歌》的汉维翻译实践中，具体体现为译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自觉认同，既要深刻把握诗歌中儒家伦理、道家哲思与佛教智慧的精神内核，又要以精准的语言转换让读者加深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感知。如何平衡“文化内核的忠实传递”与“目标读者的理解接受”，是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这就需要借助成熟的翻译理论框架。彼得·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对此提供了重要启示。

彼得·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中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是其翻译理论的核心所在，也是最具特色与影响力的组成部分。他(Newmark, 1991)曾明确指出，这是他对“普通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1]。纽马克将语言功能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从文本类型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这两个关键概念，从而奠定了其翻译理论的独特地位，并对翻译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理论层面，纽马克的翻译研究以语言功能为出发点，强调翻译策略的选择应基于语言在具体文本中所发挥的功能。因此，系统梳理和分析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该理论对翻译活动的指导意义，也能有效提升翻译实践的效率与质量。

当前学界对《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同语言的翻译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聚焦文本源流、哲学内涵转译、翻译策略选择与量化分析等问题。在文体与哲学层面，任竞泽(2013)通过考辨《好了歌》与东晋“了语不了语”杂体诗的源流关系，指出其对“好”“了”辩证哲学的继承与创新，为译本的文化内涵解读奠定文本基础[2]。骆冬青(2018)则从“甄士隐解释学”切入，强调《好了歌》及注文的“通

灵”阐释价值,指出一部作品真正的命意所在,是可以从题目来显现的[3]。这为译本的哲学意涵传递提供理论参照。在多语种译本研究中,英语译本是核心对象:滕志雪(2018)对比不同英译本,分析“神仙”“功名”等意象隐喻的译法差异,指出了更贴近原文文化意象的译本[4]。周泽奇等(2025)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理论,量化对比两英译本的经验意义传递效果,发现杨译在心理过程与关系过程的还原上更忠实于原文[5]。此外,德语、日语、俄语、蒙古语等译本的研究亦各具侧重:赵轩(2021)以语料库方法对比库恩与史华慈德译本,通过类符形符比、迷雾指数等量化指标,揭示库恩译本的归化倾向与史华慈译本的直译特征[6]。赵秀娟(2011)、张书畅等(2025)分别探讨伊藤漱平日译本对“好了”韵脚的处理及诗性结构再生策略,指出其在文化意象简化与语体适配中的得与失[7][8]。章小凤(2019)引入“准确性指数”和“随意性指数”分析《好了歌》俄译,认为1995年帕纳秀克重译本的文化补偿较为到位[9]。萨础拉(2024)则关注蒙译本中“好”“了”关键词的译法差异,并讨论更忠于原文对话语境[10]。除此之外,阿布都外力·克热木主编的《四大名著的翻译论稿》(2023)中也有学者探讨《红楼梦》译本以及传播情况。其中,再纳汗探讨了《好了歌》中的诗歌美学,以及维、英、俄等三种语言的翻译特点[11]。

《红楼梦》维译本为汉维翻译提供了经典范例。通过剖析其开篇诗词《好了歌》的翻译,可深入探讨汉维两种语言在语义、意境及文化内涵上的转换方法,此举不仅丰富了翻译理论,也为后续文学翻译实践提供了宝贵借鉴。然而,现有对《红楼梦》中《好了歌》的研究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其一,在研究语种上,多集中于英语、德语、日语等主流外语及蒙古语等少数阿尔泰语系语言,而对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语言维吾尔语的《好了歌》译本则关注不足。其二,在研究方法上,维吾尔语译本研究多聚焦于词汇翻译方法与句式适配等问题,结合维吾尔语特有的文化语境与韵律特征进行了深度探讨,不过很少并置于系统的翻译理论框架下去进行分析。其三,本文尝试引入译者性别身份这一崭新视角,以期揭示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本生成的潜在影响,探讨译者性别身份这一因素在翻译和选词过程中的体现与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在纽马克翻译理论框架下,将以2025年新版维吾尔文《红楼梦》(儿童选读)为个案,剖析《好了歌》维译本的翻译策略。

2. 《好了歌》维吾尔语翻译实例分析

彼得·纽马克(1981)界定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前者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而后者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Newmark, 1981: p. 68)。简单来说,根据不同文本类型,译者要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注重原文语境、侧重原文,而交际翻译侧重的是目的语和译文产生的效果。交际翻译具有重效果、简洁明了的特点,弥补了语义翻译中意义的缺失,又经过适当的润色使得译文效果更佳。同时,纽马克也强调“交际翻译要求为某一类读者‘量体裁衣’,实现某一种具体的功能”[1],而表达型文本以作者为中心,翻译时宜采用“语义翻译”。并且,应当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交替使用,并进一步指出,若两种翻译形式一旦存在冲突,就可选择交际翻译。

2.1. 词汇层面:文化负载词与核心概念的维译策略剖析

关于如何去译,2000多年来,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从古罗马时期至今都还未停止。在此基础上,纽马克认为翻译术语如果换成“语义性”与“交际性”去区分,才会解决这一大问题。他认为“忠诚度的冲突,强调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差距,将永远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压倒一切的问题”(Newmark, 1981)。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1981)提出,“纽马克详细分析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重在传达原文的语义内容,交际翻译则注重读者的理解和反应。纽马克照顾到了文本的广泛差异性,这使以上两种不同的翻译法显得特别重要”[12]。在翻译《红楼梦》时,译者需要准确传达原文中的儒家、道家、佛教

思想及传统价值观等文化内涵。

下面分析《好了歌》维吾尔文译文是否准确传达原歌出世与入世思想矛盾，以及对社会现象批判与反思，探讨翻译策略对文化内涵传递的影响，如直译、意译、音译加注释等策略在不同语言内涵传递中的应用效果。

首先词汇是翻译的基本单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好了歌》中存在大量具有深厚汉文化底蕴的核心概念，其翻译是跨文化传递的关键。本部分选取典型译例进行剖析：

例 1：“神仙”

原文：“世人都晓**神仙**好”

维译：xæliqi alæm dæjdu birdæk æwlija obdan.

分析：“神仙”是中国道教文化特有的概念，指超脱生死、逍遥自在的得道者。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把神仙一词解释为“有超能力的、可以超脱尘世长生不老的，比喻会预料或猜透事物的，比喻逍遥自在、毫无拘束和牵挂的人”。在《现代汉语词典》汉维对照版中把该词译为“æwlija ænbija”。《红楼梦》196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维吾尔文译文中把该词翻译成“pærištæ”。在新译文中选用“æwlija”，不仅和《现代汉维词典》中所解释的词义保持一致，忠实了原文，并体现了纽马克翻译理论中所提到的可读性，若译为“pærištæ”，虽易被维吾尔读者理解，但可能模糊了道家“神仙”追求个体逍遥与长生不老的独特内涵；若采用音译加注(如“jenjien”)，虽能保留文化特异性，但可能增加理解负担。此处译者的选择反映了对文化可接受性与概念保真度的权衡。

例 2：“荒冢”

原文：“**荒冢**一堆草没了”

维译：gørlirini otlar besip boldi bayawan

分析：“荒冢”指荒草丛生的坟墓，蕴含凄凉、衰败、人生虚无的意象。“荒冢”(荒凉的坟墓)和“草没了”(被野草淹没)是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意象，共同构成了一幅萧条、败落的画面，用以批判功名的虚幻。维吾尔语中“qæbristan”(墓地)、“yerlik”(坟堆)是常见词。“tjöl”(荒野)在维吾尔文化中本身也带有苍凉、孤寂的联想。不过维吾尔译文选择了“gor”也传达了“荒”(荒凉、废弃)的意境，并且也符合诗体格律呈现的统一性。译文通过添加“otlar besip boldi”(杂丛生)等修饰语进行语义补偿，以强化原词描绘的衰败景象。芒迪(Jeremy Munday, 2012)曾指出“纽马克对词汇隐喻的翻译的分析是翻译研究中少数致力于功能句子视角这一重要理论的人之一”[13]。因此，在翻译隐喻此处需要考察译文对意象完整性和情感色彩的再现程度，笔者认为这是文学翻译的最大存在特点。

例 3：“功名”

原文：“惟有**功名**忘不了”

维译：æmma tjıqmas namuſøhræt jadidin tamam

分析：“功名”指功业和名声，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核心的人生追求。现代维吾尔语中缺乏完全与其对应的词汇。译者用“namuſøhræt”(名誉)一词翻译“功名”，主要侧重于“名誉、名声”这一语义，但可能削弱了“功名”一词所承载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和科举制度的历史印记。考虑到该诗歌格律翻译的规则，如此译文也是为了符合该诗行的韵律，但也突显了文化专有项翻译的挑战及译者的归化倾向。

2.2. 句法层面：句式结构与韵律特征的维译转换探究

《好了歌》出自古典名著《红楼梦》中人物跛足道人所作的七言古诗，句式简洁、多用对仗、排比和

反问，节奏明快。作为古体诗，其押韵较为自由，但整体保持了韵脚。其维译本在句法层面较好地处理了排比结构以维持原文的铺陈气势和节奏感，对反问语气的传达也较为有效，体现了译者对原文修辞功能的重视。韵律方面，译本采用维吾尔语的巴尔玛克格律(音步型格律)，以流畅性优先，贴近口语，易于传唱，规则直观。通过其排比等手段保留了相当的节奏感。本部分考察译文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2.2.1. 对仗结构

原文：“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对仗：痴心父母－孝顺儿孙，古来多－谁见了)

维译：dʒiq hamaqæt ata-ana ötti qædimdin, ʃu pærzenting sanga wapa qilghanti qatʃan?

分析：汉语的对仗讲究字数相等、结构对称与词性相对。而维吾尔语的巴尔玛克格律则要求各诗行音节数一致，此外，特定诗行的末尾还需押韵。译文“dʒiq hamaqæt ata-ana ötti qædimdin”和“ʃu pærzenting sanga wapa qilghanti qatʃan?”以主语结构相似、谓语位置对应保持了结构上的平行性。通过使用所指代词并列连接词“ʃu (pærzenting)”来营造呼应感。纽马克翻译理论中，语义翻译旨在目的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准确再现原文的语境意义，保留原文的文化、词汇和句法特色，并忠实于作者的语言形式，因此保留原文中的文本排版风格。在此框架下，译文虽未完全复制原文的对仗形式，但通过调整句法顺序、利用格后缀实现成分对应，并借助代词衔接达成语义连贯，体现了语义翻译在跨语言结构差异中的适应性策略，既尊重了原文形式特征，又实现了语义对等的表达效果。

2.2.2. 排比结构

原文：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维译：

xæliqialæm dejdu birdæk æwliya obdan,

æmma tʃiqmas namʃøhræt jadidin tamam!

xæliqialæm dejdu birdæk æwliya obdan,

æmma tʃiqmas altun-kymyʃ jadidin tamam!

xæliqialæm dejdu birdæk æwliya obdan,

æmma tʃiqmas sæteng henim jadidin tamam!

xæliqialæm dejdu birdæk æwliya obdan,

æmma tʃiqmas æs-jadidin pærzenti tamam! [14]

分析：排比必须是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相关、语气一致的几个词或句子的并列使用(傅陈茜，2009: pp. 84-85) [15]。汉语排比句一般由三项或三项以上语句组成，它便于表达强烈的感情，突出所强调的内容，增强语言的气势。同时由于句式整齐，节奏分明，也可以增强语言的韵律美。原文通过重复“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忘不了！”形成强烈节奏感和讽刺效果。维吾尔译本也保留了这种排比结构。每节的起始句“xæliqialæm dejdu birdæk æwliya obdan”保持了高度一致性。维吾尔语排比句中的强调与否定语气，是借由“æmma tamam”等特定语汇达成的，而非采用汉语中诸如变换“忘不了”之类结构的方式。由此可见，保留排比结构是维持歌谣体节奏感的关键。

但值得关注的是,译文中的“娇妻”在维译版本中翻译为“sæteng henim”,笔者注意到翻译中译者的性别是否对译文的选词有影响。杨贵春(2016)在研究中提到,“娇”既含“柔弱需呵护”的怜惜,(如贾琏初纳尤二姐时的态度),又暗藏“骄纵任性”的贬义(如王熙凤对尤二姐的敌视)[16]。这种矛盾在维吾尔语“sæteng”中难以完全对应。赛文娟(2014)指出,在清代语境中,“娇妻”特指贵族阶层中养尊处优的女性。如贾宝玉称林黛玉“娇生惯养”,暗含其“四体不勤”的贵族特质[17]。原著用“娇妻”彰显古代女子对于丈夫而言的重要存在,而维吾尔语译文因“sæteng”的正面色彩过弱,笔者认为使讽刺变为直接指责,丧失汉语的微妙感,笔者建议改用“nazinin xotun”(娇媚的)弱化负面感。纽马克指出:“翻译批评是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环节”[1]。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还需灵活运用已构建的理论体系对不同译作展开系统分析与客观评价,其核心目的在于推动不仅民族文学,乃至各文本中翻译质量的提升。

2.2.3. 韵律与节奏

在诗歌原文中整体押韵(如“好”“了”),音节简洁。在维吾尔译文中首句字尾字均为 obdan, (意为“好”),构成韵律的重复。

每节次句尾字分别为 tamam, 意为“结束、完全”,与首句 obdan 形成韵脚呼应,即 tamam-obdan 为固定韵对,四节均遵循这一规律,形成规整的 AABB 韵律结构。维吾尔语诗歌有其独特的音节要求和韵律规则。原文虽带口语化哲理,但整体仍属规整诗歌体裁,其维译通过诗体韵律的运用,既保留了维吾尔语诗歌的传统审美,又与原文“规整中见通俗”的风格相匹配,避免了因过度口语化导致的韵律松散。

词语选择和优化方面优先选用双音节或三音节基础词汇,如 æwliya “神仙”,(3 音节)、altun-kymyf “金银财富”,(双音节组合),避免多音节复杂词汇(如未使用“mal-mylyk”“财富”这类 4 音节词汇),减少句子冗余感;同时重复使用 xæliqialæm deǵdu “世人都说”(6 音节)这一固定短语,通过重复句式形成节奏惯性,抵消长句带来的阅读负担。以下表格将从优化类别出发,对应列出具体词汇、中文含义、音节数及优化目的,方便对照参考:

句式拆分与停顿设计方面维吾尔译文虽为长句,但通过逗号分隔与语义断句模拟短促节奏,如首节“xæliqialæm dæǵdu birdæk æwliya obdan, æmma tǵiqmas namǵøhræt jadidin tamam”,将长句拆分为 4 个语义片段,每个片段对应短暂停顿,类似原文“七言一句”的节奏间隔;且每节均保持“2 句 4 片段”的结构,形成统一的节奏框架,让整体阅读节奏更接近原文的明快风格。

译者未拘泥于原文“七言”的形式限制,而是通过维吾尔语语言特性,如固定短语重复、语义断句。在长句结构中重建了与原文等效的节奏感知,这种补偿策略实现了纽马克翻译理论中翻译的形式规整与语义还原的统一。

2.3. 语篇层面:整体意境与批判主旨的维译传达评鉴

《好了歌》的维吾尔语译文在语篇层面成功再现了原诗衰败空幻的核心意境和强烈的劝世讽喻基调。对否定世俗欲望批判的传达较为清晰有力。然而,对于深植于道家、佛家哲学的特定思想底蕴(如“了”的哲学内涵),译本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本土化调适,使其更符合维吾尔读者的语言文化认知框架和维吾尔文化背景下的生命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原诗特定哲学色彩的淡化,但增强了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共鸣力和劝诫效果。

2.3.1. 整体意境的营造

原文中通过“荒冢”“草没了”“眼闭(闭眼)”“随人去”等意象群,构建出衰败、空幻、虚无的意境,讽刺世人沉迷虚幻。维吾尔语中则用“gør”(荒坟、坟墓),“bajawan”(野草、杂草),“udunyæka

bolidu rawan”(归于尘土、走向尘世的终点),“ketidu”(离去、逝去)等表达上述的意象。从词汇选择来看,“gør”在维吾尔语文化中同样是与“生命终结、死亡”相关的核心意象,其传递的“荒凉、肃穆”的情感色彩与“荒冢”高度契合;“bajawan”作为自然意象,在维吾尔语境中常用来象征“无人照料、任其生长的荒芜”,与“草没了”所蕴含的“时光流逝、万物荒芜”的语义相符。“udunyæra bolidu rawan”虽未直接对应“眼闭”,但“归于尘土”的表述更贴合维吾尔语对“生命终结”的习惯性表达,同样传递出“生命走向终点”的核心语义。“ketidu”则以简洁的动词形式,精准对应“随人去”中“离去、消逝”的含义。

笔者认为,曹雪芹在《好了歌》的创作中,有意避开了格律严整的诗体形式,转而采用句式自由、富于民歌气息的七言句式,以此在艺术形式上直接呼应其看破红尘、警醒世人的核心思想。这一形式选择,确保了诗歌在艺术风格与思想内涵上的高度统一。相应地,维吾尔文译本在处理这一文本时,其整体语言风格并未追求表层的口语化对等,而是偏向于书面与典雅。这种风格策略一方面契合了维吾尔语在表达生命、死亡、劝世等严肃主题时的语言传统;另一方面,它也精准地呼应了原作“形式通俗而思想深刻”的内在特质。译本通过庄重的语言风格,有力地强化了诗歌深层的劝世讽喻基调,使读者在感受文本庄重感的同时,更能深刻领会其传递的警世理念。

2.3.2. 批判主旨的传达

原文对功名利禄、娇妻儿孙等世俗欲望的彻底否定与批判,宣扬“了”(放下、解脱)的出世思想。其维译结尾劝诫部分及对“好”与“了”的处理使用了“obdan”,“tamam”等表达这层含义。从文本语义层面出发,原文核心可进一步细化为双重逻辑维度:其一,对世俗价值体系的否定性批判,具体指向功名利禄的功利性、娇妻儿孙的情感依附等物质与情感层面的欲望载体,这种批判并非局部否定,而是对世俗追求“整体性意义”的消解;其二,对精神解脱路径的建构性宣扬,“了”作为核心概念,不仅包含“放下”的行为指向,更蕴含道家思想中“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内核。通过消解世俗价值的意义,实现主体从欲望桎梏中的解脱,最终达成“出世”的精神境界。这一主旨的传达,既依赖核心概念的精准传递,也依赖文本语气中“决绝性”与“哲理性”的双重语义特征。然而,人生活在现实中,不能摆脱世俗,追求名利是一种必然。但凡事都有一个限度,过分追求,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译本中,“好”(世俗之好)与“了”(解脱)分别对应“obdan”与“tamam”,且在全文反复出现的语境中保持了语义的稳定性。从语义场理论来看,“obdan”在维吾尔语中本指“好、优良”,与原文中“世俗之好”的表层语义契合,准确传递了世俗价值所标榜的“积极属性”。而“tamam”的核心语义为“完成、终结”,通过隐喻延伸可理解为“对世俗追求的终结”,与“了”所蕴含的“消解欲望、达成解脱”的深层语义形成对应。这种术语选择遵循了语义翻译以原文语义为中心的原则,避免了因术语歧义导致的主旨偏差。

对于“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这一承载批判主旨的核心句,译本采用直译方法,保留了原文的句法结构与语义逻辑。从纽马克对“直译”的界定来看,当原文句法与目标语句法无根本性冲突,且直译能完整传递语义时,直译是语义翻译的优先选择。该句的直译不仅确保了“好”与“了”语义关系的明确性,即:“世俗的美好终将走向终结,而终结世俗追求才能实现真正的解脱”,更通过句法的对称性,强化了原文中的哲理性语气,正是语义翻译中抓住原文核心语义,超越表面形式的差异,实现了语义优先、主旨保真的翻译目标。

3. 结语

本文以《红楼梦》核心诗词《好了歌》的维吾尔语翻译为考察对象,将文化建设思想中“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思想与纽马克翻译理论融合，系统剖析了中华经典文学跨民族语言翻译中的文化传递难题与解决路径。《好了歌》所蕴含的“世事无常”的哲学思考、“超脱欲望”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共通精神内核的集中体现。维吾尔译本通过精准传递这些文化内涵，既让维吾尔族读者领略到汉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以“本土化调适”，如将道家“神仙”概念与维吾尔文化认知框架衔接，搭建起民族文化对话的桥梁，实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效果，完善了文学文本的译介路径。

参考文献

- [1] Newmark, P. (2001)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39-41.
- [2] 任竞泽. 《红楼梦》“好了歌”文体源流考[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1(3): 59-65.
- [3] 骆冬青. 论《红楼梦》“通灵”阐释学[J]. 江苏社会科学, 2018(6): 217-223.
- [4] 滕志雪. 《好了歌》中的意象隐喻及其英译对比[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8, 37(12): 129-131.
- [5] 周泽奇, 陆丹云. 及物性视角下文学翻译质量的对比研究——以《好了歌》英译本为例[J]. 海外英语, 2025(11): 53-55.
- [6] 赵轩.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翻译风格对比研究——以《好了歌》两德译本为例[J].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1, 41(9): 45-47.
- [7] 赵秀娟. 试析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本中“好了歌”及“好了歌注”的翻译[J]. 红楼梦学刊, 2011(6): 200-213.
- [8] 张书畅, 张惠. 译者主体性与诗性结构再生——论伊藤漱平的《好了歌》及《好了歌注》日译[J].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4(4): 8-11.
- [9] 章小凤. 从两个量化指数看《红楼梦》诗歌的俄译——以《好了歌》俄译为例[J]. 知与行, 2019(2): 87-91.
- [10] 萨础拉. 《红楼梦》之《好了歌》两个关键词蒙译对比研究[J]. 中国蒙古学, 2024(3): 153-160.
- [11] 阿布都外力·克热木. 思考与探索 四大名著的翻译论稿[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23.
- [12] Nida, E. and Taber, C. (2004)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13] Munday, J. (2001)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Routledge.
- [14] 曹雪芹. 红楼梦[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25.
- [15] 傅陈茜. 汉英排比修辞的对比与翻译[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 2009(8): 84-85.
- [16] 杨贵春. 《红楼梦》人物“绰号”维译处理——直译与意译[J]. 中国民族博览, 2016(10): 206-207.
- [17] 赛文娟. 浅析《红楼梦》中的谐音双关及其维吾尔语翻译[J]. 文教资料, 2014(17): 28-29.